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刘迎胜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翻译的苏俄巴托尔德教授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①最近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是书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沈卫荣、李肖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笔者因忝列译丛编委会而有幸先睹。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的翻译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据译者在序言中介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已经据《突厥斯坦》1928年英译本译出了汉文本的初稿。1964年，两位译者见到此书俄文本第二卷，发现其中有原英译本缺失的第五章，附录中的《论文答辩前的发言》及文献目录部分，遂决定依据新版俄文本补订汉文译文。1976年准备了译文第二稿后，又于1978年见到收有C. E. 博斯沃思的《补注与订正》的英译本第三版，遂再次补译。同年底译者见到俄文原本《巴托尔德院士全集》第9卷所附地图后，译绘后收入译文。至此翻译工作才算基本完成。为便于读者查核原文，译者在汉译本页缘注明英译本与俄文原本的页数。其索引中的所有条目先用英文录出，再配以相应俄文和汉译。使用非常方便。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笔者有幸考入南京大学师从韩儒林教授学习元史，巴托尔德的名著《突厥斯坦》为必读书。其时笔者初习俄语，靠翻字典苦读，非常吃力，所以主要依靠是书英译本。^②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张锡彤、张广达先生出席。他们带来了论文《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③据张广达先生在会上介绍，是书的翻译工作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但一直未能印行，学界期待了四分之一世纪。

《突厥斯坦》是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伊斯兰时代中亚历史文化的权威著作，书中所涉及的核心地域从中国西北直至包括独联体中亚五国及其周边地区在内的广义内陆亚洲地区，其主要时间跨度从8世纪至15世纪，达700年以上，所涉及的史料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与察合

①〔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学界惯例简称此书为《突厥斯坦》，本文从之。

②此书翻译至今已近30年。此外学界常用者还有巴托尔德的其他著述的西欧文字译本，如：《中亚研究四种》米诺尔斯基英译本（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 by V. Minorsky, Leiden, 1956）、《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亚突厥史》（W. Barthold,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1945）等。

③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00～213页。

台文文献,也包括作者所知道的汉文与蒙古文史料。虽然当代我国许多西北民族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此书,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认真读过者并不多,其汉译工作更非长期关注中古时代汉—伊斯兰历史文献比较学的专家不敢问津,故翻译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由于该书对我国学术界了解有关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的史料极为重要,也是提高我国中亚研究水平的必读书,因此其汉译本的问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翻阅汉译本后深感《突厥斯坦》的汉译工作既是翻译,也是学术研究。汉译者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们所增加的注记之中。汉译者在序言中说,“为了有所补充也偶尔写出附注”,在印行时“括以弦月形括弧【……】以资区别”。^①实际上他们所增的注记相当多,除了一些说明性的以外,学术性附注大体可分为:

(一) 纠正原文错误

《大唐西域记》的儒莲法译本,误解《西域记》卷一记“宰利地区”的原文中“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等语,将其译为“居民刚刚有了若干历史记载,他们自上而下地阅读这些记载的文本,互相交换得自这些典籍的知识。就是这样,文献知识得以不间断地被保存下来。”巴托尔德据此称“穆斯林征服以前,中亚有无历史著作,今已无从确知。七世纪中国旅行家玄奘说到有这类著作,可是这类著作甚至连标题也不曾流传下来。”汉译者出注说明“儒莲译文枝蔓失真,导致巴托尔德误以为依据玄奘的记述,当时中亚地区容或已有历史文献。”^②

又如第81页:针对巴托尔德的“十世纪时,帆延、喀布尔与哥疾宁合为一个省区,受一位土著王公的统治,帆延为其首府。今天从巴里黑前往帆延,通常取道于胡勒姆;但当日阿拉伯地理学家则注意另一条路,即溯巴里黑河上行,然后西折入于来自胡勒姆的大道。”译者针对“西折”出注云:“俄文本与英译本均作‘西折’,疑应作‘东折’”。

(二) 提供史料标题译文

巴托尔德所研究的领域是蒙古时代初期及其以前伊斯兰时代中亚的历史与文化。其著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涉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台突厥文的史料与文献。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当年巴托尔德在其原作中按西方学术规范,这些文献的标题多数以拉丁文转写的形式出现。这对于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并了解其转写规则的专家和读者来说,可以通过拉丁文转写字方便地复原原文,换而言之并不构成阅读障碍。但我国从事西北地区历史研究的学者多数不具备这种学术素养,如对穆斯林史料采取拉丁文字原文照录的方式,译文的可读性将大大下降。因此译者在注记中对许多常用的史料,在录写拉丁文转写标题的同时,还将其意义译为汉语。如比鲁尼(Birūnī)的著作 *Athār ul-Bākiya*, 译者补入汉译《过去世代的遗迹》。^③这种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

(三) 评述原作者的某些观点

巴托尔德在谈及萨曼王朝(Samanids)的史学时,提到该王朝的韦齐尔^④巴勒阿米在352/

①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序言,第7页。

②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页及同页注1。

③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页及同页注2。

④ Vazir, 明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人物门”音译为“卧即儿”,意为“臣”。

963年将塔巴里(Tabari)^①的《编年史》^②译为波斯文,巴氏评论道:“在塔巴里的阿拉伯文原作刊行之后,巴勒阿米事实上已无史学价值可言。”在原著与译文之间,尽可能选择原著当然是史家的准则。但巴勒阿米当年翻译塔巴里《编年史》时,所据原文不同于当今常用文本,而且巴勒阿米在翻译过程中,时有增加。因此其波斯文本并非简单的翻译。对此译者出注:“巴托尔德这样全盘否定巴勒阿米译本的价值,今日看来,似有未当。巴勒阿米曾保全了塔巴里书今日已失传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若干史料,因此在他的译本中有一些记述不见于今塔巴里书之莱顿印本。”^③

(四) 提供最新的研究与出版等学术信息

《突厥斯坦》虽然是公认的权威著述,但也毕竟是一百余年前的作品。在学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自我设限于巴托尔德所用文献当然是不可取的,继承作者勤于探索的传统才是真谛。比如,汉译者在史料部分对原作所述引许多穆斯林史料的新近研究与出版情况作出补充。如译到有关《世界境域志》的内容时,汉译者补充道:“V. 米诺尔斯基的英文译文经 C. E. 博斯沃思增订,于1970年在伦敦印行了第二版。”^④又如,在有关阿拉伯学者亚库特的学者传记辞书的马戈利乌思(D. S. Margoliouth)教授校订本在汉译者的注释中补充道:“按,此书之马戈利乌思校订本共七卷,已全部出齐”,并给出全部刊行年份。^⑤

故此汉译本提供的研究信息要比即使忠实于原文的译本多得多。对于读者来说,在了解了原著的同时也补充与更新了知识。

同样因为《突厥斯坦》所述历史错综复杂,涉及语言文字多,地理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翻译难度高的缘故,笔者在阅读中感觉汉译文中个别地方或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兹举数例说明:

(一) “河中与河中府”

译文中对乌浒水/阿姆河外之地(Transoxania, 阿拉伯语 *Мавераннахр*)均按许多学者的惯例译为“河中”或“河中府”(参见索引)。

“河中”或“河中府”这个词使用最多的是耶律楚材,他在《西游录》中提到寻思干(Semizkent)^⑥时说“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他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在中亚写了许多诗,其中《赠蒲察元帅七首》之一提到他曾访问过管辖蒲华(Bukhara, 不花刺)的女真人蒲察元帅说:“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城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耶律楚材时居寻思干,此城位于蒲华(不花刺)之东,故曰“西城”,又称为“锦城”(其第二首诗中有“莫教辜负锦城春”

① 受条件限制,本文在录入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转写字时,不得不略去字母上下添加的音点,以下不另作声明。读者在使用时,敬请注意核对原文。

② 汉译者将此书译为《年代记》(全名《诸先知与诸王的历史》),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3页注释①。

③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2页及同页注4。

④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6页及同页注5。

⑤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3页及同页注8。

⑥ 突厥语“肥城”,又音译为“邪迷思干”、“薛迷思贤”等,即撒马尔罕(Samarqand)。

句)。^① 楚材认为不花刺的风光超过寻思干,所以说“锦城风景压河中”,河中即寻思干。

耶律楚材《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之一有“幽人呼我出东城”一句,“东城”即指寻思干,相对于西城,即蒲华。其四有句“河中二月好踏青”,共五有句“二月河中草木青”,其六有句“归来不识河中道”。这里的“河中”即上文之“东城”,即寻思干。

楚材还写有《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和《河中游西园四首》。后者之一有“且著新诗与芳酒,西园佳处送残春”。其三有句“闲步西园试一巡”,^② 可见“河中”指寻思干,城中有“西园”。

寻思干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郊阿弗拉锡亚卜(Afrasiyab)遗址,恰为两条河所围绕,这应当是它在西辽时代被称为“河中府”的原因。因此“河中”在西辽—蒙元时代,并非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农耕区,而专指寻思干城及其辖区。而英语 Transoxania、阿拉伯语 ماوراءالنهر 在古代汉文文献中并无对应词,窃以为译为乌浒水外之地/阿姆河以北之地为宜。

(二) 两条水渠的名称

译文第132页注9“布哈拉方言称阿里克(ariq,水渠)为卡姆,参看我写的 *Орошение* 页29。西特尼亚科夫斯基将 Kām-i Zar 与 Ju-i Zar 译为‘大泽尔与小泽尔’,由此可知,方言中卡姆一词系指大于波斯语中称为术(Ju)或术伊(Juy)之渠道而言,参看我写的 *Орошение*, 页120。”此注文中 Zar 意为金色, Kām 系指干渠或主水渠,而 Ju 或 Juy 则为普通水渠。故 Kām-i Zar 意为“金色干渠”,而 Ju-i Zar 则可译为“金色支渠”。另外, Juy 见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本田实信编号第42词“جوى(jūy),河,卓衣”^③。此字亦见于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本田氏编号第1058词“河,卓亦”^④。جوى(jūy)作为复合词组成部分亦见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本田氏编号第69词“جويچه(jūycha),沟,桌衣彻”,及第72词“لبجوى(lab-i jūy),岸,勒必—卓衣。”^⑤

(三) 养尼肯特与养夷

第207页第2段:“扫兰以下,锡尔河流入古斯人占有的草原。养尼肯特位于距锡尔河口二日程、离河1法尔萨赫处。养尼肯特意为‘新城’,阿拉伯人称之为 al-Qaryal al-Haditha,波斯人称为 Dih-i Naw; 文献中亦常称之为谢赫尔肯特,这一名称有时也出现在钱币上。”这里的养尼肯特(Yanikand),即“新城”,就是明陈诚所描述之养夷(Yāngi Shahr)。突厥语 yāngi(南部突厥语,即乌古思语作 yeni),意为“新”;明会同馆本《委兀儿译语》“通用门”中之“新,阳”^⑥即此字。shahr 为波斯语,此言城;明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地理门”中“城,舍黑儿”即此。而 Dih-i Naw 为波斯/塔吉克语,意为“新村”。其中之 dih 意为“村庄”,而 naw 则译为“新的”。

① 谢方校点:《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91页。

② 《湛然居士文集》,第95~100页。

③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第467页。《回回馆译语》巴黎本在“河”字右侧,有无名学者标音 ho,其下拉丁文释义为 fluvius minor(小河)。在汉字音译“卓衣”之上标音为 tchouo y。无名法国学者的译意“小河”与波斯文意同。

④ 《回回馆译语》,第607页。

⑤ 《回回馆译语》,第469页。

⑥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第603页。

(四) 牛乳城

第207页第7行：“锡尔河左岸属于法拉卜的城镇有休特肯德与韦西只。”同页注5“我们在这里依据图曼斯基抄本（Hudūd al-‘Ālam, 页24b）采取了Sutkand这一读音，意为‘牛乳城’……”sūt，突厥语意为“乳”，并非专指牛乳。故译为“乳城”为优。蒙元时代突厥人称赛里木湖为sütkül，意为“乳湖”，《海屯行记》曾提及之。

(五) 巴耳赤刊与巴儿真

第236页译文倒数第1行提到术赤西征时的“巴尔钦利格肯特”。同页注7为：“普朗·迦尔宾书中（Beazley刊本，页76，110，152）；[Мален译本，页24，51]作巴尔钦（Barchin），契拉科斯书中作帕尔钦（Parchin），术赤朝钱币上作Bārjīn（Лерх，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ездка，页10~11）。中国转写作Ba-eulh-chi-li-han，Ba-eulh-chen（Schefer，Chrestomathie persane，II，页167）；布雷特施奈德书（《中古东亚史料考证》，II，页95与地图）作Ba-eh-chi-li-han，在穆斯林资料中，此城名称亦简作Bārjikand……”这里注文中提到的Ba-eulh-chi-li-han/Ba-eh-chi-li-han/Bārjikand即《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之“巴耳赤刊”。而译文中提到的巴尔钦（Barchin）/帕尔钦（Parchin）/Bārjīn乃《元史》卷1《太祖纪》中记述成吉思汗西征时所提到的“巴儿真”。

(六) 阿比韦尔德/八瓦耳/巴瓦儿的

第230页注5“马克迪西（BGA，III，页300，340）仅将你沙不儿的《金库》这一名词用来指称你沙不儿附近三个最富饶的城镇，即徒思、奈萨与阿比韦尔德”。此译名还出现于译文多处（见索引第685页）。阿比韦尔德（Abiward）即《元史》中之“八瓦耳”。《元史·阿剌瓦而思传》提到：“阿剌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仕其国为千夫长。太祖征西域，驻蹕八瓦耳之地，阿剌瓦而思率其部典来降。”^①同书第63卷《西北地附录》作“巴瓦儿的”。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已收。^②

(七) 库奇卡尔/科查尔/火赤哈儿

第371页译文第2段第1行中的“伊金奇·本·库奇卡尔”，同页注6中“花拉子模沙埃金奇·本·科查尔（Ekinchi b. Qochar）”中的埃金奇（Ekinchi）为突厥语akin-ci，或此言农夫，而其中之akin意为谷物、粮食。此人名称中的库奇卡尔/科查尔（Qochar）元代音译为“火赤哈儿”，元世祖时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与之同名，见于虞集所撰之《高昌王世勋碑》或《元史·巴儿术阿而忒的斤传》，其意为公羊。

(八) 巴里失/锭

第450页第2段第6~7行“最初，巴勒契奇竟敢为其原值10—20第纳尔的织物索价3金巴利什（bālish）。”同页注5“关于巴利什的价值，诸说不一；参照拉施都丁书，Quatremère刊本，页320；术兹贾尼书，Raverty，译本，II，页1110，注6。据加特麦尔所引术外尼的记述，1巴利什在当时值75第纳尔。”又第702页索引“bālish，[бальш]，巴利什（钱币名）”。bālish在波斯语中意为“枕头”。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衣服门”本田实信编号第539词有“بالش（bālish），枕，把力石”；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器用门”本田实信编号第1336词之“枕，巴

① 《元史》第123卷《阿剌瓦而思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26页。

② 中华书局，1980年，第13页。

力失”即此。因中国银锭形似枕头，故在蒙元时代又特指金、银锭。元代波斯文史料言及金银时，常以“把力石”为单位。1“把力石”银子，相当于汉文中一锭银子（50两）。

（九）花刺子模沙母后

第386页第2段第2~3行“伊勒—阿尔斯兰病卒后，幼子苏勒坦—沙赖其母图尔坎之助得登沙位……”同页注2：“图尔坎（Turkân）一词，常见于突厥族女王的名字中，并非专有名词，意为‘王、夫人’……”此字可音译为“帖里蹇”，辽皇后号。元太宗窝阔台乃蛮真皇后脱烈哥那（Töregene）应源于此。

（十）丞相

第533页第2段第3~4行：“钦桑太傅（显然是中国人）与不花一努沙系撒马儿罕与布哈拉的长官”。并见第716页索引。这里的钦桑太傅（Ching Sang Tai Fu）当为汉文头衔丞相大夫/丞相太傅。Jingsang/Chingsang/丞相的称号在蒙元时代传入西域，在13~14世纪的波斯文献中很常见。

（十一）《世界征服者史》、黑沙漠

第471页注4“依照 Ta' rikh-i Jahân-gushây 校订者的意见，正确的读音为 Qarâqûm（哈拉库木）”。注中所提到的 Ta' rikh-i Jahân-gushây 即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的波斯文书名标题。Qarâqûm 突厥语 Qara qum，意为“黑沙漠”，即今土库曼斯坦之卡拉库姆沙漠。Qara，突厥语译言黑色；qum，突厥语意为沙漠。此字元代译音不定，如元定宗贵由死于“忽木升吉儿”，《元史》作“横相乙儿”，^①《辍耕录》卷1《列圣授受正统》写为“胡眉斜杨吉儿”；^②皆为突厥语 Qum sāngir “沙岬”的音译；而元世祖中统年耶律希亮避兵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浑八升”，则为突厥语 Qum bashi “沙漠头”的音译。上述诸地名中的“忽木”、“横”、“胡眉”和“浑”均为突厥语 qum “浑”的音译字。

（十二）阿难达与东干人

第492页：巴托尔德引志费尼的记载说，蒙古军攻下花刺子模都城后，俘工匠达10万余名，“这些人被迁往‘东方’，在那里结成数目甚多的居民点”。此页注3曰：“这些迁往‘东方’的花刺子模人有可能是东干人的祖先，也许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东干人的祖先信仰了伊斯兰教……此处征引了拉施都丁关于王子阿楠达与其军队……”这里提到的“东干人”指中亚操突厥语民族对我国回族/回回人的称谓。但当代“东干”在汉语中一般专指清同治年“回乱”中被清军击败后逃入俄境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回族起义军后裔，故译为“回回”或“回族”为宜。另外这一段文字中的“王子阿楠达”应为安西王忙哥剌之子阿难达，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大德十一年元成宗去世后在参与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被诛。^③

（十三）关于勘同与译音用字问题

《突厥斯坦》翻译的难度之一是专有名词的译音问题。其难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寻找同时代汉文文献中提及者，即所谓“勘同”；其二是同时代汉文史料中未出现者如何译。两位译者在序言中提及：“我们深知译本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最显著的是有些人名、地名和若干类

① 《元史》第2卷《定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卷。

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第9页。

③ 《元史》第108卷《诸王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35页。

似术语的名词,我们翻译得不够恰当,会让读者感觉欠缺。”^①“地名的翻译同样是困难重重。”“人名、地名以外,还有些类似术语的专门性名词译起来也很困难。”“有些旧译名久已无人理睬,势将永远作废,如阿剌必已被阿拉伯代替,刺合蛮已被拉赫曼代替,可以肯定其决不会东山再起。”^②

译者之一张广达教授在“补记”中谈及译音之难:“翻译此书,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译名。自从冯承钧先生(1887—1946)在《多桑蒙古史》的译序中提出‘名从主人’的原则以来,学界翕然相从,没有异议。韩儒林先生(1903—1983)有关蒙元和西北史地的论著严格讲求审音和勘同;翁师独健(1906—1986)撰《斡脱考》、邵师循正(1909—1973)译释刺失德丁《集史》蒙元诸汗纪,无一处不精心考究符合时代的读音与用字。以上各位先生在知道家父从事本书的翻译工作时,均直接间接嘱咐在译名上多下工夫。邵师和冯家昇先生(1904—1970)进而叮嘱注意唐代译例与蒙元时代译例的差异。邵师甚至提示,穆斯林作家的名字也最好依其原籍而区别阿拉伯语、波斯语和阿尔泰语系的不同读法。”

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感到,《突厥斯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术语,远远超出了唐一元时期文献所提供的译例和用字范围。而“《元史》和元人文集之外,其他诸如《元朝[蒙古]秘史》、《华夷译语》所提供的译例和用字在翻译穆斯林名词时也有很大局限。”同时译者认为“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似乎不宜模仿当时,再把‘哈桑’一律译做‘阿三’”。为此,他们又征求了马坚与纳忠两教授的意见。马坚教授的意见是“在经过比定确为一人的情况下,采用蒙元时期的译法当然可以,否则难免制造假古董和张冠李戴之嫌”。^③译者因此陷于两难境地。

内陆亚洲研究专有名词的译音用字,是困扰学术界的老问题。上述两位译者所提及的韩儒林师、邵循正教授、翁独健师与冯家昇先生,均为我国现代内陆亚洲研究的先驱。而冯承钧先生则是当时向我国学术界介绍法国亚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他们所代表的主要是专业研究者的意见,即认为《突厥斯坦》的读者多数是学术界同仁。马坚先生的意见所代表的是多数国内外文学翻译者的意见,其翻译作品的读者多为普通大众。

作为专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不同文字史料之间所记史实异同的比较问题,非常需要确定汉文史料与非汉文史料中相关专业名词的对应关系。因此不同时代汉字音写非汉族语汇的规律与译例,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代与元代的外来名词译音,对于解决尚未确定的不同文字史料之间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而决非刻意制造假古董。这就是为什么从冯承钧、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与冯家昇先生不约而同地希望《突厥斯坦》的汉译文能够遵循传统译法,找到存在严格对应关系,甚至还应考虑突厥语与蒙古语元音和谐律在译名中的体现问题。

“审音与勘同”是当代内陆亚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清乾隆年训诂学发展起来。训诂中有假借之说,即音近而互训。如《庄子·至乐》“俄而柳生其左肘”。这里“柳”即“瘤”。也就是说将汉字置于另一个同音字的语境之下来观察,寻求词义与读音之间的联系,进而求解古人文意。这种分析方法与理工科运用现代的分析手段观察材料很接近。那么现代学术界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出现呢?我觉得有,“审音与勘同”(THE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①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版译者序言,第14页。

②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版译者序言,第14~17页。

③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版译者序言,见第19~20页。

IDENTIFICATION OF THE NON-CHINESE HISTORICAL TERMS) 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审音勘同”就是将文献中的音译外来词,按它所使用的时代的语音复原,继而与它所源出的语言原词比较。可见,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来研究古籍中有关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的记载,如同将这些文献比作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物质材料,将这些材料置于科学仪器之下观察,所看到的当然比肉眼要多,要深刻。“审音勘同”的要旨就是,透过记载音译外来词或术语的汉字,探求其所内含的过去时代的信息。此研究方法 19 世纪末首创于法国汉学界,20 世纪 30 年代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并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从此原则出发,似乎还应考虑《突厥斯坦》的汉译文中的专有名词与流传较广的已译作品的协调,以免初学者产生误解与混乱。如本译文中的“赤因帖木儿”^①在《多桑蒙古史》《世界征服者史》中均译为“真帖木儿”。如不加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可能不知道“赤因帖木儿”与“真帖木儿”是同一人。而马坚教授的意见主要代表了外国文学翻译界的意见,因其译作的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这两种意见本无正误之分。学术翻译虽然包含研究原作学术思想的成分,其主要目的是介绍异族学者的成果,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毕竟不同,故而笔者虽然提及对某些译名的处理意见,其目的只是出于商榷,并不是以此来苛求译者。

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我国研究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的学者多未接受过穆斯林语言文字与突厥语言学的训练;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与突厥语学界的同仁则史学素养稍缺。因此我国中古时代内陆亚洲研究者对与汉文史料几乎同样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多数依赖翻译了解:或通过英译,或通过汉译。而迄今译为汉文的穆斯林史地著述不过数种,如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和华涛教授翻译的《苏拉赫词典补编》等。因此巴托尔德的《突厥斯坦》所提供的穆斯林史学的知识对提高我国学界的水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突厥斯坦》汉译文严谨,反映了译者认真的学风与批判的思维,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巴托尔德原作,也包括译者多年积累的学识。表明专家翻译的作品与一般译者的译作之间有根本的不同。阅读它是享受,也是学习。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索引中指出,此名见于原文第 415、457、465、475 页。